

文史资料选编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九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73,000 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600

书号: 11071·142 定价: 0.78 元

我的回忆	张友渔 (1)
“二·七”惨案经过	
——京汉铁路工人第一次大罢工	凌必应 (40)
顺义县一次农民运动的片断	王斐然 (53)
附：乐天宇同志的回忆	(58)
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	于树功 (62)
回忆孙中山先生北上及 北京民国日报被查封的经过	邹明初遗稿 (70)
“本社”始末	邓昊明 (79)
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	张克侠 (103)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纪事	郝宇新 (148)
长夜曾盼东方白	
——记“一二·九”时期在清华大学的经历	华道一 (170)
“一二·九”运动史料拾遗	朱熹谱 (179)
卖艺生涯(上)(自传之二)	侯宝林 (186)

东交民巷使馆界和清代堂子重建	单士元 (226)
附：堂子考释	王钟翰 (230)
正阳门	单士元 (232)
回忆龙门书局	严幼芝 (236)

我的回忆

张 友 渔

(一)

我于一八九九年一月，按旧历来说，是戊戌年十二月，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

我父亲张映南，是个私塾先生，前清的秀才。他有点地，不多，出租，收点租子，也可以算个小地主。但，我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他教书的收入。就他本人来讲，应该算个自由职业者。我三四岁时，亲生母亲就死了。十来岁时，继母也死了。我下边还有个小弟和小妹，所以我从小就得帮着父亲料理家务。父亲有时回来晚，我就带着弟弟妹妹自己做饭。我后来一直能吃苦耐劳，不讲究吃穿，跟童年这段生活有关。但就我的家庭出身来看，不能算是劳动人民。

从五岁开始，我就随着父亲在私塾念书。那时念的都是“四书”“五经”那些东西，所以受孔孟之道影响不少。辛亥革命时，我十二岁了，还在私塾读书，已经可以写点旧诗旧文。那时，已接触到一些康梁维新派的书刊，我很喜欢看。从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进而接受了不少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县里成立小学。我父亲当了县模范小学校长，还兼教语文。那时，全灵石县只有五所高等小学，东、西、南、北乡每乡一所，城里一所。初级小学多些。语文、算术是主课，另外还有图画、体操等课。每个小学只有二三名教师。

那时候上小学的人不多，许多人还想读旧书。我的亲戚朋友家也有些人想读旧书，便到我家补习。我也就在家一块学，并协助父亲教几个年纪小的学生。我的兄弟去上小学了，小妹就在家中读书。这时候，我除了自学和帮助父亲教课外，同时还得照料家务。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兄弟上了高等小学（那时的小学，初小三年，高小四年），学校里有英文之类的课程。我的算术和英文，就是用我兄弟的课本自学的，也学了不少。

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我十九岁了。我兄弟高小毕业，要到太原考中学，我也想一同去。家中困难，没有钱。父亲有一个学生，也是我家亲戚，在太原师范当数学教员，他鼓励我们去上学。在这之前，我差一点去学买卖。我们家乡的人，在北京天津的当铺、银号里工作的很多，有的人还当了经理。因为山西人会做生意，胆又小，不敢胡闹，所以开当铺、银号的人愿意雇用山西人。我有个堂兄在天津，曾捎信让我去学生意，赚钱。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我父亲的这个学生来了，他借给我父亲十块钱，让我们兄弟二人去太原考学校。十块钱在当时来讲就不少了。我就和弟弟到了太原。那时我们家乡在太原上学的人很少，到北京上学的一个没有。太原的中等学校办得好的有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这两个学校我都考上了，我决定上第一师范。因为师范是官费，吃饭公家供给，每年还发两套衣服，一件棉大衣，发课本，提供宿舍。上第一中学要自费，我上不起。到太原

报考时，住在一家小店里，花钱不多。

当时我因受康、梁影响，对时事感兴趣，喜欢看报。在家时，我那位天津的堂兄，也寄些报纸回家给我们看。阎锡山为标榜他的“新政”，办“模范省”，在每个县都设有阅报室，有宣讲员。我每天都到阅报室看报。报看多了，自己也就想写点东西。那时太原出有《山西画报》，象现在的《参考消息》一般大，内容除图画外，有新闻，有小故事。我仿照《聊斋志异》里的《念秧》，写了一篇《新念秧》，寄给它，给登载了。我对报纸更有兴趣了。到太原后经常给报馆投稿，那时太原第一师范有不少学生给报纸投稿，一般都写社会新闻，发表了，报社就给一两毛钱的稿费，虽然不多，但对一个穷学生来说，也就不少了。那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钱不多，写上几篇，赚点钱，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够了。一般每个月都可以赚几块钱，所以生活得还可以。我写的东西都是亲身看到或听来的，比较实在，有些人是自己编的，所以报社对我投的稿比较信任，登的也就多些。后来因为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被选为学生会长和省学生会执委，社会活动多，接触的事情多，所以投稿就更多，内容也就更丰富，更有重要性，因此被聘为报社的特约记者，按月发给固定工资，每个月五六块钱，后又加到十块，生活就更过得去了。我那时主要还是受康梁改良派和胡适他们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一些。当时在太原还很少能看到马列著作，因此，信仰马列主义的人还不多。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山西学生高尚德，也叫高君宇，假期回太原，约集三五个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彭真同志(原名傅茂公)和贺昌(原名贺其颖)、纪廷梓参加了这个小组。我那时知道他们，对他们相当敬佩，但思想认识还不一样。

在“五·四”运动期间，山西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会，我是执行委员，侯外庐也是执行委员。当时组织了讲演团，开展了检查日货的活动。这时第一师范成立了一个“共进学社”，成员中有信共产主义的，有信三民主义的，也有胡适派、康梁派。“共进学社”出版一种刊物叫《共鸣》，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高沐鸿(原名高成均)、张磐石(原名潘敬业)，都先后参加过这个组织。

当时山西有两家大报，第一大报是《山西日报》，第二大报是《并州日报》。我因常给《并州日报》写稿，所以，当他们的总编辑请假不在的时候，还让我去代理过总编辑。

这个时期，我还参加过一个学术界的社会主义组织。其中的成员现在还在的有邓初民。邓是山西法政学校的教授。他们办了个刊物叫《新觉悟》，主要成员是教授，只吸收了两个学生参加，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法政学校的高叔康。邓初民和我一直有联系，来往较多，因他年龄比我大十几岁，所以被别人称为“忘年之交”。

总之，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适而社会主义。最初接触的还是费边社会主义，最后才进步到科学社会主义。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学校组织毕业生到北京参观，由地方上补助路费。我们县有五个学生毕业，县里给每人补助了四十元。到北京参观前，学校当局已决定让我留校在附属小学教书。我想继续上学，所以参观结束时，我就留在北京没有回去。我报考北京大学，因为它对英文的要求很高，我的英文文法不错，但发音差，记的单词也不够多，没考上。又去考法政大学，被录取了，而且考了个第一名。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都考得不错。法政大学分本科、预科；本科四年，预科

二年。侯外庐也同时考上了这所学校。那时的大学生，不少人半工半读。大学生中，在学习方面有特别好的，也有特别坏的。平时，上课不上课都可以，只要期考、年考能及格就行。你可以钻研你要钻研的东西。不象现在这样严格，这样统一。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我带来的几十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当时住在宣外大街五十号灵石会馆里。那是清朝时代来京赶考的人住的地方，不交房租，火炉子之类要自己花钱。吃饭很便宜。当时一毛钱可以换二十一个铜板，一斤面要十六个铜板。吃一顿饭半斤面，再吃个白菜汤或豆腐汤（一、二个铜板）；两顿饭只要十八、九个铜板就够了。有时在人力车伕吃饭的小饭摊上吃顿荞面条、烙饼，还要便宜些。早饭就更简单了。我每天上学，从宣外大街，经过绒线胡同、西单，到李阁老胡同。在绒线胡同口，有个小面馆，叫“西域斋”，有稀粥、烤白薯。有时就在那儿吃两个烤白薯，喝一碗粥。一天三顿饭花一毛钱，一个月有三块钱就够了。那时北京没有公共汽车、电车，有钱的人坐人力车，我们是走路。后来学校搬到国会街，即象坊桥和象来街，离我住的地方近了些。

刚到北京考北京大学时，我住在沙滩附近东老胡同的一个公寓里。那时，大的公寓象个旅馆，小的就是个小院子，出租房子，有的还包饭。租钱有一元五角一个月的，有两元一个月的。包饭要六、七块钱，总共也花不上十块钱。

考上法政大学之后，我又开始给各报社投稿。有新闻、短文，也有长文章。每月可得十几元稿费。从太原来时，《并州日报》社让我当驻京记者，每天给它打十几个字的电报。在这十几个字中，得有几条新闻才行。例如张作霖一号回奉天，我就发：

“奉张东返奉”。他们收到电报，再加上几个字，就是一条新闻。那时，地方报纸电报新闻很少，都是用头号大字排。我的工资每月十五块，电报费十五块，生活也就慢慢改善了。

我后来有多年跟《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发生关系。这家报纸是无党派人士成舍我办的。先办《世界晚报》，后来又办《世界日报》，最后还加了《世界画报》。我是先跟“报屁股”发生关系的。《世界晚报》的“报屁股”是“夜光”，《世界日报》的“报屁股”是“明珠”，都由张恨水主编。为了有比较好的稿子的固定来源，他们招考特约撰稿人，有不少人应考。结果，共选了四个人，其中有我，还有马彦祥、胡春冰、朱虚白。每月工资也是十五元。后来我还做了《世界日报》的教育编辑。“三·一八”惨案那天，我在现场，目击了段祺瑞执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的暴行。我在《世界日报》上写了报道。当时《世界日报》比较敢说话，比较倾向进步，受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销路不错。

刚到北京不久，我参加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分化过程中，我成了国民党左派。到一九二七年六月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介绍人是盛志权，他是西城区委书记、市委委员、中国大学的学生。北京市委第二次被破坏时，书记李渤海（后来改名黎天才）叛变，盛志权牺牲了。

一九二七年前半年，我开始办《国民晚报》。这是一张作为我党市委进行合法斗争的宣传工具的报纸，同办的两个人是左笑鸿和张友鸾。张是团员，左是我们的积极分子。这张报，原是国民党左派黄少谷办的。黄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去驻在河南的冯玉祥部队工作。李大钊同志给他的介绍信，缝在棉袍里。冯对李大钊同志很尊敬，黄去后，因有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因而很信任他，曾

担任冯的秘书长。后来这个人变坏了。

黄少谷走的时候，要把这张报纸盘给我们办。他原来的资本是三百元，我们一人拿了一百元，顶了下来。

成舍我这个人，抱着当“新闻大王”的野心，想搞个新闻托拉斯，除北京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外，又在上海办了《立报》，在南京办了《民生报》。他那时住在南京，他的爱人杨璠在北京管理《世界日报》。她向我们提出，你们要办《国民晚报》，就不要在《世界日报》工作，要在《世界日报》工作，就不要办《国民晚报》。左和张因同《世界日报》关系深，不能离开《世界日报》，我离开了《世界日报》，继续办《国民晚报》，并找武新宇（团员）、陈显文（即陈高儒，党员，三十年代变坏了）一起办，由他们各出一百元退给了张、左。在这之前，我还给上海《申报》做过特约教育记者，给武汉《中山日报》做过驻京通讯记者。

我原名张象鼎，字友彝。友渔，是一九二八年后用的。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我经常用的笔名有：友彝、忧夷（这个笔名一直用到一九三三年）、有仪、犹予、犹疑、游泥、悠然等。后来用友渔多些，特别是正式文章。此外还用过平周、萍周、萍州等。到重庆香港后，用过香汀、若愚、友愚、章若榆，还用过忧虞等。

（二）

一九二七年六月，正是蒋介石在南方背叛革命，张作霖在北方残酷镇压革命的严重白色恐怖时期，我在北京入了党。入党后，主要是办党的合法斗争报纸《国民晚报》，同时担任新闻特别

支部书记，后来参加北京地下党临时市委，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

在这之前，北京市委已被破坏过两次，一次是李大钊时期，一次是李渤海时期。李渤海被捕后叛变，改名黎天才，当了张学良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冬，我们的临时市委又被破坏，这是第三次。我于十一月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书记谭哨云、副书记马天安等。一九二八年三月，我被保释出狱，失掉党的关系。一九二八年夏，在天津找到组织，恢复了关系。

在天津接上了关系后，我被分配在军委系统工作，领导人是廖化平，他是北方局军委的负责人之一。我的任务是打入国民党阎锡山派政府，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情报工作，以及掩护、救济我们党员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联合张学良，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天津原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失败后，天津和北平移交给张学良。这时，我们有三十多位被捕的同志，为首的是薄一波，还关在天津“临时自新院”里。我们就趁阎、张移交的时候，利用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开展营救被捕党员的工作。当时，阎锡山派的天津市长崔文徵，又叫崔廷献，是阎锡山所信任的老官僚，他同国民党有矛盾。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去找他讲：“山西派已经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人交给蒋介石、张学良？让蒋介石、张学良把这些人杀了，对山西派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捣蒋介石、张学良的乱，对山西派还有好处。”崔文徵听了，觉得有理，就撤销了“临时自新院”，把关押的人全放了。

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山西派天津市政府科长。我利用这个地位，给党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军委张兆丰同志由天津去顺德一带搞武装暴动，就是我给搞的通行证。除了薄一波等同志外，还营救了其他一些同志。陈潭秋同志来津后，曾到市政府找我直接布置营救同志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出国时也来过天津，在天津开过会。我听到过廖化平的传达。

我救出薄一波等三十多位同志后，蒋介石派的天津市党部扬言要逮捕我。一九三〇年冬，组织上让我离开天津去日本。到日本后，主要是了解日本社会情况和革命运动的形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我参加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反日活动，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我又回到了北平。

这次回到北平，我的公开职业，一方面在《世界日报》做主笔（这个报纸当时倾向进步，学生们比较欢迎），一方面在燕京大学、民国学院等院校教书。党内的工作，是在我党北平市委特科系统搞文化活动和情报工作，领导人是周贻。当时北平在张学良统治之下。有人向张学良讲我是共产党，张就警告了《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成害怕了，让我离开北平去日本做驻东京特派记者。周贻同意我去，还交给我任务，让我了解日本的情况，并与日党联系。我于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到东京。在日本期间，一方面以“忧夷”的名义给《世界日报》写特约通讯，主要是报道日本的社会情况、阶级斗争情况和革命形势，并加以分析和论述（张学良警告过成舍我，说“东京通讯”是共产党写的），一方面给党继续做情报工作，利用各种机会，给周贻送回一些情报。

一九三三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我又从日本回到北平，在《世界日报》做主笔，写社论。同时在北平大学法商

学院、民国大学、中法大学和中国大学教书。在民国大学还担任新闻系主任。这时，我仍在周贻领导下搞党的特科工作，主要做上层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并办了一个同人刊物，叫《世界论坛》。当时同我一道工作、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有杨秀峰、黄松龄、徐冰（即邢西萍）、温健公、王思华（当时叫王右铭）、阮慕韩。

在这个期间，国民党更注意我了。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组织上派我去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恰巧在我走的那天晚上，国民党中央驻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副团长丁昌，河北省党部调统处长詹朝阳，北平市公安局侦缉队长等，率领宪兵、特务、警察几十个人，包围了我的家，来捕我。因为下午我已经走了，他们扑了个空，只捕了我的人力车夫，并在我家“蹲坑”好几天。凡是去找我的人，他们认为有嫌疑的就抓。抓了阮慕韩、王思华、朱哨谷等五、六个人。在北平《晨报》工作的刘尊棋同志当晚知道了这消息，就发电报给我，叫我“暂勿回京”。我留在太原。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我走的那天，《世界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反对日本人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社论，说：“不管于学忠该不该撤换，日本人提出要求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政府不应当接受。”因此，《世界日报》被北平政委会下令停刊五天。

当时国民党要抓我的理由是，说我是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并说我要在蒋介石到绥远视察的时候，派人在平绥路上埋地雷炸死他。这是一个叛徒瞎供的、国民党编造出来的。国民党知道我在太原，就打电报给阎锡山派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要他把我押送南京。徐永昌请示阎锡山，阎锡山是个两面

派。当时，他担任山西省绥靖主任，实际是山西的“太上皇”。阎同蒋介石有矛盾，想搞自己的一套，他想从共产党那里学点东西对付蒋介石。当然他并不敢用共产党人，只想利用两种人来达到他的目的：一种，曾是共产党员，现在脱离关系的，特别是叛徒；一种，讲马列主义理论，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学者。他当时正在搜罗这两种人。侯外庐同志一九三三年在北平保释出狱后，回到太原，给他讲学。他认为我也属于后一种人，所以也要留我在太原讲学。后来，徐冰、温健公在北平呆不住，也去太原讲学。阎锡山让徐永昌给南京回电说：“此人不在太原。”但因山西省党部是蒋介石派，我在太原他们是知道的，阎不好再留我，就把我送走了。

我在太原期间，曾给阎锡山讲世界经济总危机的问题，并批评他企图用所谓“物产证券”代替货币解决经济危机的想法，指出，在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是行不通的。他也承认这只是帮助跛子走路的一条拐杖，不是根本办法。我还指出他要实行的“土地村公有”，实际是地主阶级的“公有”。

我于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再去日本。我不能经过北平。离开太原后，经石家庄、郑州转陇海路，又从徐州转津浦路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几天，便搭船到日本，在长崎上岸后，转东京。

这个时期，我在日本，主要是在上野图书馆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特别是关于新闻方面的论述，曾经用日文写了一本《日本新闻发达史》一书。同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调查工作，曾到九州、东北、北海道、大阪、神户等地。我离开太原时，留在太原同我一道做特科工作的徐冰、温健公经常同我保持联系。

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的市党部和宪兵第三

团等撤离北平，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徐冰通知我，形势变化，可以回来。我于八月间回国，仍在太原工作，曾同韩幽桐一道，到天津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南汉宸处接受任务。我在太原呆了几个月，红军东征后，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被调回北平，公开职业还是在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教书。同时在华北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工作。王世英住在天津，来平时，就在我家开会，布置工作。这个时期，我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和宋哲元联系，做宋的统战工作。宋哲元部下当时分为三派。一派亲蒋，如北平市长秦德纯；一派亲日，如天津市长肖振瀛；一派主张与我党合作，如刘治洲、张克侠。张克侠原是我党党员，失掉关系，在宋哲元部任军副参谋长兼师参谋长。他在南苑办了个参谋训练班，还请我去讲过课，课程叫日本问题，实际是根据理论和现实宣传抗日。当时中央还派张经武来平，做为中央（或军委）的秘密代表，通过刘治洲（当时都叫刘老头）与宋哲元联系。我同他在工作上互相配合。我还带张经武去绥远见过傅作义，动员傅抗战。傅作义说：“只要宋明轩（即宋哲元）抗战，我就出兵。”当时已经发生卢沟桥事变。我七月十五日回北平时，已经是最后一趟车了，西直门已不能随便通行了。

二是搞华北救国会工作。主要负责人有许德珩、张申府、杨秀峰（当时叫杨秀林）、黄松龄、程希孟、刘清扬（女）和我。徐冰同志也参加了，但他不出面。对外活动，头头是许德珩和张申府。该会实际上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接受我党的领导，公开搞抗日救国活动。彭真同志曾代表北方局指导过我们的工作。

三是做上层文化界的工作。我经常联系的有几十个左派教

授，如吴承仕等。每两、三个星期搞一次聚餐会，交换意见，根据党的方针，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时候，由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左派要抗日，青年党的一部分（就整个青年党的方针来说，是反共的。主张抗日是在同国民党争权，不是真要同我党合作抗日），甚至托派的一部分（就托派整个口号来说，是先倒蒋，后抗日。实际上是既不抗日，也不倒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托派的方针是支持日本侵华）也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活动。所以除了国民党死硬派、亲日派、汉奸外都可以团结、争取。对蒋介石，我们是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更进到联蒋抗日。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新启蒙学会，宣传抗日、民主，也就是反对蒋介石对外不抗战、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主要负责人是张申府、吴承仕、杨秀峰。国民党的反动学棍、师大教授杨立奎，曾在北平《晨报》上登“声讨新启蒙学会”的启事。我曾在师大召集的学生大会上和他公开辩论。

再就是办刊物，出了《时代文化》，后来改称《文化动向》，公开发行。主编人有黄松龄、吴承仕和我。我负责政论部分，黄负责学术部分，吴负责文史部分。齐燕铭除帮助吴外，并搞封面设计、版面编排等技术性工作。经常负责人是黄松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七月二十九日前，张克侠经常与我们联系，还要求我们发动群众协助他们做保卫北平的防御工作，如做工事，守城墙等。当时我们还用“保卫马德里”的口号做为号召。七月二十九日晚，张克侠给我来电话，说宋哲元变了，说他们晚上刚开过会，决定当晚撤退，不打了。由张自忠暂代宋哲元的地位，同日本妥协，以保存实力。